◆专家视点

做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创新的基础性工作

□严书翰

建设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虽然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但是应该说，现在是创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最佳时期。这是因为理论创新来自于伟大的实践。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成功实践，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世界上少有的发展奇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这是实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创新并在世界上赢得话语优势的丰厚资源。为此，我们需要对现有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进行梳理和提炼，这是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基础性工作，而且这项工作本身也是一种创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发展和经济社会变革相适应，涌现出许多经典理论名句。这些句子言简意赅、富有哲理、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可以说它们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创新的原创资料。比如，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摸着石头过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发展才是硬道理，执政党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和群众利益无小事。还有经济特区、一国两制、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名句，为创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提供了丰厚资源，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民族复兴中国梦是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政治宣言，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是团结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一面精神旗帜，充分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历史担当和使命追求。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是当代中国最生动的实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复兴中国梦是最大公约数。从话语体系上看，提出民族复兴中国梦本身也就是重大话语体系创新。围绕民族复兴中国梦这一核心思想，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系列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点的话语，这些话语具有原创特征。如，中国梦的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道路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关键一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金钥匙，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经济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两手抓，两手都抓好；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权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等等。

今天我们需要下大气力，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和经济社会变化发展基础上形成的极其丰富的原创话语进行梳理和提炼，这是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基础性工作。需要我们扎扎实实把这项基础性工作做好。应该说这个工作也在做，但还是初步的，还未能有效整合资源，还未形成强大的合力。与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期盼，还有差距。

只要我们对已有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这些原创话语进行梳理和提炼，就会发现可以把它们划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属于党的文献语言与学科语言有机结合的话语。比如，经济特区、一国两制、以人为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协商民主、共同富裕等。这些话语既具有中国特色，本身又是学科语言。比如，“以人为本”，如果仅从字面上看，这个提法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来了。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实践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步地赋予了它全新的内涵，今天以人为本成了我们表达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党的文献语言。毛泽东用“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来概括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邓小平有“人民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的名言。江泽民认为“三个代表”，最终是要落脚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的。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把像以人为本这类话语转化为学科语言甚至是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范畴。从而为党的基本理论提供学理支撑。

另一类是属于极具特色或称之为十分朴实的话语。除了前面提到的“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等老百姓喜闻易解的话语外，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党的文献中又涌现出不少这类话语。比如，用“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来表述要实现科学发展、全面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用“要有天下为公的宽阔胸襟，摒弃私心杂念，夙夜在公、勤勉工作”来表达领导干部要有戮力复兴的历史担当。用“功成不必在我”来倡导我们所要树立的正确政绩观，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作为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根本要求，用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来表示我们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决心。还比如，党的文献用“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来表达“三农”问题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目标的重中之重。用“记得住乡愁”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一项重要要求。用“不能政府一换届、规划就换届”来指出以往我们在规划工作上的教训，等等。作为理论工作者应该把包含在这些话语中的哲理内涵揭示出来。我们这么做就是在梳理和提炼已有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就是在做学术话语体系的创新工作。列宁有句名言：真理是朴实的。所以决不能把党的文献中这类朴实的即“接地气”的话语同没有学理性画等号。

笔者认为，当前我们梳理和提炼已有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点工作，就是要把民族复兴中国梦作为核心思想和关键话语，并且要把它有机地结合到哲学社会科学的相关学科中去。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我们理论工作者既要揭示民族复兴中国梦所包含着深刻的时代内涵，又要运用相关学科的重要概念、基本范畴为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话语体系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撑。这是创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借用邓小平的话说：这是一项“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

◆理论研究

避免制度“空洞”与“虚置”

□朱联平

现实政治实践中，许多好的制度却不能达致预期效果，出现了制度“空洞”“虚置”等现象。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课题，也是一个长期困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现实难题。破解这一难题，还是应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遵循制度自身运行规律的前提下，进行大胆的制度革新，关键是要坚持制度的整体性建构原则，充分发挥制度应有的功能效力。

按照制度革新与变迁中的功能特征和要求，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坚持制度的科学设计原则，而制度的科学设计关涉诸多方面的要素，包括公平性、程序性、效率性、层次性等诸多方面。但就今天政治社会现实而言，我们尤其要注重制度的整体性建构。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各个领域都制定了相当繁多的制度，但为什么效果不佳，总是显现有“制度”而无“制度治理”的情况，党风、官风、学风、商风的腐败仍有蔓延之势，寻其原因是这些众多的制度缺乏有机整体性，许多制度彼此隔离，形成制度“孤岛”现象，制度“孤岛”使许多好的制度功能难以发挥，成为摆设，这是形成制度“空洞”和“虚置”的直接原因。制度“空洞”和“虚置”造成了许多现有制度资源的严重浪费。以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为例，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依据社会发展和自身发展需要，先后制定、发布了大量涉及党内干部监督、党员民主权力保障等有关党内民主监督的法律法规“条例”“意见”“准则”等，总数统计有80余件之多，应该说党内监督制度已经够全面的了。但是，许多贪官依然视监督于不顾，照贪照腐。这不是党和政府对反贪反腐的认识不够，也非制度的数量不够，而是制度的整体性缺失造成了制度的“空洞”和制度“虚置”，从而导致贪官们有机可乘。

制度的整体性建构就是同时关注四个相互关联的制度建设环节：一是制度的重点性。比如对于党政干部反腐倡廉建设，宜将重点放在建立干部财产公示制度和司法垂直管理制度两个层级上，在这方面，香港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廉政建设就是我们的很好镜鉴，那些不疼不痒的制度就算堆积如山，也收效甚微。二是制度的严密性。各个制度应相互衔接，环环相扣，这是避免制度“空洞”的重要条件。许多好的制度，因为衔接性不强，前后呼应不够，某一处出现“短板”，结果使已有制度成为摆设、装饰，在滥权和腐败行为面前变得软弱无力。三是制度的执行性。有了制度，一定要认真执行，做到令必行，行必果。我们不是没有制度或者说是好的制度，应该深入检视执行环节上的力度有没有，因为不执行，就造成制度资源的虚置和浪费。制度不执行怎么办？监督制度要跟上，也就是上述第二点提到的制度要有严密性，环环相扣。四是制度的补救性。如同市场失灵一样，制度亦非绝对和万能，也偶有失灵的时候，当制度链环的某一环节缺失时，必须要有若干个预设的制度方案相互补充，方可达致制度的预期效果。

以上四点中，制度的关键性强调的是要抓住几个关键的制度，是重点论；制度的严密性强调的是制度之间要相互兼顾，是均衡论；制度的执行性强调的是制度刚性，是实践论；制度的补救性强调的是制度的预设风险，是方法论。这种整体建构原则就是要将制度建构的思维上升到一个哲学辩证的逻辑高度。果真如此，也才能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避免制度“空洞”和“虚置”现象发生，发挥制度的本来效能。

◆学术前沿

改革进行时：理论、方法与实践

——“中国马克思主义论坛2013”在中央党校举行

岁末寒冬，但丝毫没有影响与会人员的参加热情。28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理论工作者齐聚中央党校，出席由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论坛2013”。论坛于2013年12月29日在中央党校举行。此次论坛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改革进行时：理论、方法与实践”为主题展开。

论坛开幕式上，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何毅亭致辞并作开题演讲。李书磊、张伯里、李忠杰、贾高建、辜胜阻、王玉庆、邢贲思、刘海藩、杨春贵、孙庆聚、侯树栋、许志功、李兴山、郝时晋、罗宗毅、黄宪起、梁言顺、王东京等出席了论坛开幕式。杨春贵、辜胜阻、李兴山、何增科、房宁、李建明、刘尚希、叶兴庆、赵大光、龚维斌、范周、王玉庆等12位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三个分论题分别发表了专题演讲。他们的演讲，对三中全会提出的重大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进行了多学科、多专业的深入研讨。

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与会领导和专家认为，经过35年不断改革，我国改革已从点到面、由浅入深，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所谓攻坚期，就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分外艰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都需要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就像战场上要攻克最后的坚固堡垒，必须一鼓作气，不可退缩，不可迟疑，不可松劲，原地踏步，停滞不前不仅不能突进，而且可能前功尽弃。所谓深水区，就是下一步改革将不可避免地触及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和利益矛盾，牵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阻力会越来越大，必须迈稳步伐，否则难以达到胜利的彼岸。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力度和深度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的重要体现，也是党中央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体现。

与会领导和专家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正确的方法论，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论断。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就必须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方面改革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顶层与基层的关系等。

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全会提出的重要新论断。与会专家认为，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我们在推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除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以外，还面临一个制度现代化的重要任务。要实现这个任务，需要从治理目标、治理体系建设、治理价值理念三个方面努力。要总结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家治理的经验，加以坚持并进一步实现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要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对此，与会领导和专家提出，要充分认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新论断的重大意义，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要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努力转变政府职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启动基于国家治理的新一轮财政改革，从四个方面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全面深化改革还需继续推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这是与会领导和专家的共识。他们在演讲中强调，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要创新社会管理理念，打造社会治理这个社会管理的升级版；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把生态文明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中。

“中国马克思主义论坛”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大型学术理论论坛，是基金会的公益品牌项目，每年举办一届，今年是第五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论坛的总主题，每届结合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确定一个分主题。

（李萌供稿）

◆理论研究

政策实验与中国的制度优势

□宁 骚

所谓政策试验，指的是凡属影响持久、深入、广泛的大型公共决策，在可能的情况下，要选择若干局部范围（如单位、部门、地区）先试先行，然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形成整体性政策或者再全面铺开实施政策这样一套做法。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的改革，是在没有前人经验、他国成例作为参照的条件下进行的，具有突出的开创性和探索性。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是个很大的试验”。政策试验作为政策工具，一直被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并且形成一套成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具体地说，政策试验对改革决策所起的作用主要有这样几方面。

使中国的改革决策得以把发展目标的紧迫性与发展过程的渐进性很好地结合起来。中国的现代化是追赶型现代化。如果发展目标低，中国就难以摆脱落后状态；如果发展目标高，在发展过程上又急于求成，企图一步到位，造成的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找到了把发展目标的紧迫性和发展过程的渐进性很好地结合起来的有效方法：一方面，他强调发展目标要高，发展速度要快；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强调试验和试点的作用。政策试验使中国的改革决策既避免了可能因追求高目标而导致的急躁冒进，也避免了因强调渐进性而可能出现的保守性。

有助于提高改革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决策的民主性指的是在决策流程上是自下而上、上下互动的；在政策内容和政策结果上是体现、维护和增进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策试验的实行，使分散的、无系统的民意得到整合，并在各试点的试验中获得实践的形式，然后经过总结和提高而形成政策。这样形成的政策以及政策实施的结果显然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决策的科学性指的是决策程序的安排和政策工具的配置能够有效地达成政策目标、政策结果符合政策目标的设定。政策试验的实行，使决策者针对现实的政策问题，从各试点的实践中探索设定什么政策目标、怎样开掘政策资源和配置政策工具、政策的各种利益相关者朝着什么方向发生变化，以及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什么样的因果联系，从而使形成的政策更符合相关事物固有的规律。中国各项重要的改革决策都强调从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国情出发，“大胆地闯，大胆地试”，从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中寻找突破口，在“摸石头”的实践中探索和认识“过河”的一般规律，从而切切实实地提高了民主性和科学性。

中国的改革决策因政策试验而节约了改革的成本，降低了改革的风险。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证明，任何重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改革，如果不经过政策试验，都可能出现决策失误，使改革付出巨大的成本，甚至演出满盘皆输、万劫不复的惨剧。中国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违背了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结果强动员造成了大灾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方面发生的变革都是史无前例的，但是由于各项改革决策都是建立在试点——推广的基础上的，就使改革基本上避免了大的失误的发生，邓小平就此指出：“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

使中国的改革决策得以及时发现和大力扶持新生事物成长。对中国的改革决策来说，发现和扶持新生事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是其生命力所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又一个新生事物破土而出，突破现行规制的过程。改革决策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使这些事物从不被承认到得到承认，从受压制、受鄙视到获得健康成长所需要的制度空间。而政策试验，由于它本身具有的探索精神和发现机制，使它往往能够为新生事物的发现和成长鸣锣开道，并为它们的生命力和优越性的施展创造条件。通过政策试验，一个又一个新生事物进入了改革决策的视野；决策者以扶持这些事物的成长为诉求，得以大刀阔斧地进行制度创新。

为中国的改革决策提供了不断完善和及时纠错的机会。为政策实施而做的试点，其主要目的是测试政策的可行性和执行效果，探索如何根据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个特殊人群的具体情况去执行政策，为政策的全面推广提供经验；为政策调整而做的试点，其主要目的是对一项尚在实施的政策进行实地评估，探索对它做部分终止、增益和修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对做这样的调整先行先试以观察其实际效果。在以上两种情况下，政策试验都为中国改革决策的不断完善和及时纠错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什么政策试验能够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大放异彩？答案就是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为政策试验搭建了必不可缺的制度平台。那么，这个制度平台的构成是怎样的？

第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制度体系中，中国共产党起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马克思主义是党的行动指南，辩证唯物主义对公共决策有方法论的作用，而这一方法论则是政策试验的哲学依据。

第二，政策试验须在一定的政策理念或战略构想或政策方案的引导下才能进行，盲目的、随意而为的试验对于公共决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一个基本体现，就是对改革开放各个阶段、各个领域的重大改革举措进行战略指导，提出具有统领性、统摄性的大概念、大理论，如“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等。有这些政策理念或战略构想的指引，各项具体政策试点的试验就有了方向，就可以解放思想，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大胆探索。

第三，以试验——推广为基础的政策过程的展开，推手和掌控者是公共权力。在当代中国，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制度和实行群众路线的领导制度，则是保障公共权力在公共决策中有效运作的制度性因素。没有这样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给予支撑，政策试验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为“不争论，大胆地试”留下了制度空间。在领导和群众都存在广泛争议的情况下，要形成整体性政策并付诸试验是难获共识的，强行决策势必导致社会分裂。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在于具有制度弹性，这种弹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容纳多样性，鼓励试验、探索和创新。如果政策理念或战略构想已经达成共识，在各项重点改革举措的决策上，就可以“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经过试验，从各个试点的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对整体性政策有用的成分。这样从点到面，用事实说话，就能够在各项重大改革举措的决策上消除分歧，达成共识。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

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以来，领导体制是稳定的，政策是连续的。这样，就为政策试验提供了前提条件。倘若不具备这一条件，试点取得的经验就难以转化成政策，难以完成从点到面的推广，更谈不上进行顶层设计。原因很简单，在一些政治领导人的政策理念引导下进行的政策试验，随着发生政治变动和政策断裂，就失去了彰显其意义和作用的可能性。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西方政治制度比较研究”阶段性成果）